

玻利維亞政局的過去與現在

王建勛

壹 一九六七年的共黨顛覆危機

南美洲的玻利維亞(Bolivia)，由於長久以來的政治動盪不安，而不斷的加深着拉丁美洲普遍存在的貧窮與落後問題。在一九五二年以前，玻國部分人民承襲他們歷史的遺習，忽視文明生活的基本條件，且大多是文盲，易為執政者所愚弄，以致軍閥與獨裁橫行，內部爭權不息，因而無法奠定國家進步的基礎。在一九五二年以後，歷屆政府雖亟思在經濟、教育等方面謀求發展，但因忽略了基層的社會結構，使得在在發生了社會進步的障礙。到了一九六〇年巴斯(Victor Paz Estensoro)三度出任總統，他雖已開始重視國家各項基層建設，但由於礦業國有化所造成經濟蕭條以及通貨膨脹的惡果，對此一複雜問題已無暇兼顧了。尤其到了近年，全國仍動亂不安，到處罷工、流血，使得玻國社會與經濟更無法適應這些不停的政治劇變，因而導致國際共黨乘虛直入，造成玻國面臨共黨武裝顛覆的危機。

自古巴赤化以後，卡斯楚即不斷以金錢、武器支援拉丁美洲各國共黨從事武裝叛亂。至一九六六年，卡斯楚更以玻利維亞地勢險要，不但東南那卡瓦素(Nancahuaza)山谷地區與阿根廷、巴西及巴拉圭的邊界相接連，並且亦是南美洲的心臟，故在其整個顛覆策略上，就企圖利用玻國的共黨游擊戰，向南美洲各國伸延。於是一九六六年春天，極端好戰、傾向共匪的古巴共黨頭目蓋瓦拉(Ernesto Guevara)，就承担了卡斯楚基於國際計劃而擬具的具體行動路線，潛入玻國，以推動此一對南美洲全面顛覆的計劃。並且卡斯楚在這一計劃下，又先後派遣十幾個會與他在瑪伊斯塔(Siear Maestra)山區從事武裝叛亂的伙伴及高級軍事人員，潛入玻國支援(註一)。所以在一九六七年三月，當美洲國家正忙於準備東浦高層會議的時候，玻國即面臨全面共黨武裝叛亂，而非零散的游擊隊活動。政府軍數次遭到共黨的武裝突擊，始感到問題嚴重。雖然玻國總統巴潤托(René Barrientos Ortuño)親自指揮剿共行動，但由於共黨游擊隊的裝備精良，所處地勢險要，無形中增加政府軍清剿的困難。玻國陸軍三萬人，不但沒有足夠的裝

備，亦缺乏戰鬥經驗，面對企圖全面叛亂的共黨游擊隊，在本身軍事力量不夠應付方面，玻國政府顯得更為焦慮。因而，玻國政府一面向美洲國家組織指控古巴支援玻國共黨武裝顛覆，一面向鄰國求援。經過美洲國家組織證實蓋瓦拉在玻國從事武裝顛覆計劃，就加強了美國的警惕，美國詹森總統即呼籲美洲國家應以「堅決的力量」來對付古巴特務在西半球的顛覆和破壞行動。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玻國政府在各方支援下，不但蓋瓦拉被玻國軍擊斃，其一些古巴叛亂份子亦多被殺，而粉碎了曾震驚國際的古巴共黨顛覆陰謀。

貳 巴潤托總統罹難後的軍事政變

一九六九年四月廿七日，巴潤托總統於訪問農村途中，在距離首都拉巴斯(La Paz)不遠的奧路羅(Oruro)地方，因直昇機撞毀殞命。噩耗傳抵首都，副總統席雷斯(Adolfo Siles Salinas)宣佈接替總統職位。席雷斯曾任律師及聖一安德斯(San-Andes)大學教授。他原屬於代表「資產階級」而沒有羣衆基礎的社會民主黨，其後始創立基督教人民運動黨，主張採取智利傅瑞總統「自由革命」的經驗，進行溫和改革。一九六六年七月，因巴潤托為獲得基督教人民運動黨的支持，邀請席雷斯聯合競選，席雷斯亦因巴潤托在鄉村中獲得廣大農民羣衆支持，而改變競選總統的初衷，成為巴潤托的競選伙伴，當選為副總統。

巴潤托獲得農民擁護之主因，為其推行農業改革已有成就。自一九五二年巴斯總統時代開始，因礦業國有化所造成的經濟蕭條，通貨膨脹的惡果，加以近年礦工不斷罷工、流血，歷屆政府均未能及時改善玻國大多數農民的生活。惟自一九六五年以來，巴潤托為遏阻共黨勢力蔓延，一面完成農民自衛組織，一面認真推行農業改革。在巴潤托遇難前，很多「農社」逐漸建立起來，特別是在印地安人聚集的山谷地區，由農業改革而解除了地主與佃農間經常發生的尖銳衝突問題。因此，巴潤托頗受農民的尊敬與信仰。巴潤托逝世以後，農民傷感之餘，期望農業改革工作能由奧阮杜(Alfredo Ovando)將軍接替總統職位繼續進行，故而要求席雷斯將總統職位讓與奧阮杜將

軍。農民聯盟指責席雷斯是「聯合資產階級」實行「寡頭政治」的代表，而發動農民羣衆向首都進軍，曾造成多人死亡事件。

在巴潤托總統時期，因面臨共黨顛覆危機及左派政黨的反對，特別需要奧阮杜將軍的支持。一九六七年間，奧阮杜傾全力從事剿共，而解除危機，自此更增加了他的權力。其後各方謠傳蓋瓦拉是在被捕以後由軍方槍殺，不久以後又有所謂一份屬於蓋瓦拉日記副本落入古巴共黨手裏，卡斯楚公佈此項日記，其中有蓋瓦拉記載他被俘的情形，因而引起國際間重視，並且亦引起玻國共黨及左派青年的憤怒。他們譴責玻國軍方的「謀殺」行爲。巴潤托一方追究責任，同時又指控其內政部長安東紐（Antonio Arguedas）通謀古巴共黨而予通緝。然後就任命奧阮杜將軍組織軍事內閣，以證明軍方對此事並無責任。自此，奧阮杜就努力爭取巴潤托總統的信任，想取代副總統席雷斯的地位，企圖在一九七〇年總統選舉中獲得勝利，但是由於巴潤托突然逝世，而捲入到國內政治鬥爭之中。一九六九年七月廿三日，這項激烈無情的鬥爭，隨着農民的暴亂，就在石油問題上展開：左派議員加西亞（Ambrosio Garcia）利用秘魯石油國有化在玻國各方所引起的反響，在國會中指控奧阮杜曾接受美國海灣石油公司六十萬美元的賄款，以作爲競選總統的費用，因爲這項指控如被國會同意，奧阮杜不但將無法參加競選，並且還會失去軍事首長的職位，因此反而迫使奧阮杜儘速發動軍事政變，在不流血革命中，推翻了席雷斯政府。席雷斯逃往智利，由奧阮杜領導的軍事執政團接管政權。

叁 奧阮杜政府的國有化運動

很明顯的，奧阮杜領導軍事政變，雖表面是國內政治鬥爭上的產物，但亦是受到秘魯國有化運動的影響。因爲玻國礦產極豐，尤以錫爲最，產量居世界第二位，實爲玻國經濟基礎之所在。自二次大戰期間，玻國錫礦即爲外國資本壟斷，二次大戰以後，美國私人資本更轉向桑塔克魯茲（Santa-Cruz）省開發石油，使玻國石油工業亦爲外資佔有（註二）。這種情形所引起玻國人民的不滿，近年在國內政治上經常引起爭端。奧阮杜被控接受海灣石油公司的賄款，已牽涉到石油問題，所以在他領導政變以後，就必須要表明他的立場。他首先聲言爲解除外國壓力給國家造成的各種困難，將不允許外國人利用政治力量在玻國開發礦藏及油田。然後於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就

模倣秘魯的經驗，派軍接管了海灣石油公司在桑塔克魯茲的油場，以及在拉巴斯的財產。的確，奧阮杜政府此項行動，曾激起玻國人民無比的興奮，當時就曾有大量羣衆聚集在總統府前高呼「玻利維亞自由萬歲」的口號，並且無論是學生、政黨、工會以及輿論，對新政府的措施均表熱烈支持。所以奧阮杜政府雖背着與美國關係惡化的危險，但却穩定了他政變不久的政府。

在美國方面言，因爲華盛頓對秘魯政府沒收國際石油公司（International Petroleum Company）的財產，已感到困擾，其後玻利維亞又沒收海灣石油公司的財產，就更感到失望。因爲華盛頓在不斷增加的美國財團壓力下，爲抑止傳染性事件繼續發生，就考慮認真的使用「西肯魯帕」（Amen-dement Hickenlooper）協定中止任何援助，及對玻國的經濟關係。

事實上，玻國石油國有化以後，不但喪失每年爲數六百萬美元的稅金收入，亦因本身資金缺乏，無法接替海灣石油公司繼續石油生產，因此，隨着石油國有化運動，玻國的經濟就有了惡化的趨向。奧阮杜亦深深瞭解到巴斯時代礦業國有化所招致的惡果：在一九五七年一年中，通貨膨脹了百分之九十，財政赤字亦增加了一千五百萬美元，曾造成國家經濟極度混亂。所以奧阮杜政府石油國有化不久，就採取了一項緊急措施：保留外匯，維持幣值穩定，以減少國家財政的困難。另一方面又聲言仍容納外國資本，對海灣石油公司的財產給予補償，以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係。雖然此後礦工、農民、公務員、學生以及左派團體仍繼續要求不要給海灣石油公司補償、繼續沒收其他美國人的礦業財產、銀行，並驅逐美軍顧問團等，但奧阮杜政府並未使情勢再惡化下去。

奧阮杜政府雖努力緩和國有化運動的發展，但爲了不引起國內政治上的激烈爭端，而不敢冒然答應海灣石油公司的補償。在審慎中，只好與西班牙財團（Hispanoi）簽訂石油與天然氣開發的協定，希望由西班牙財團繼續開發前海灣石油公司所有的油場。因爲西班牙財團是一個混合性的財團組織，海灣石油公司在其中亦佔有大部份的股權。所以事實上，西班牙財團以（Camba）名義在玻國採油，所產石油仍轉運往美國，奧阮杜打算以這些賣油的錢來作爲對海灣石油公司的補償。

玻國石油國有化運動，如同秘魯一樣，亦是一種「革命」的徵象。倘有不慎，必然會引起國內反對的聲浪。奧阮杜爲要保持此一冒着引起工會團體

和學生憤怒的協議，就考慮要接受政府中左派部長們的建議，釋放法國左傾教授戴伯瑞 (Reges Débray)。戴伯瑞是於一九六七年間，在玻國接近加米利 (Camiri) 的墨高朋巴 (Mugupampa) 地方被捕，而後即以參加蓋瓦拉武裝叛亂的罪名，被玻國政府判處三十年有期徒刑。戴伯瑞曾是馬克思主義的教授，曾撰寫「革命中的革命」(Révolution Dans La Révolution) 一書，已普遍流傳在拉丁美洲青年知識份子之中。故其被判重刑以後，頗為玻國左派團體、輿論界、青年知識份子所同情。自奧阮杜軍事政變以後，玻國各方要求釋放戴伯瑞之呼聲愈來愈高，已成爲玻國政治上一項新的爭論。

肆 勞工運動與奧阮杜政府左傾

玻國自一九五二年起，礦工暴亂迭起，不斷干預國家政治。一九六〇年間，礦工支持巴斯總統連任，即與保守派軍人火併，使國內左派勢力更爲囂張。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巴斯被軍事政變推翻，其後即由副總統巴潤托臨時執政。一九六五年大選前夕，另一副總統雷欽 (Juan Lechin)，因其在工會的領袖，乃煽動礦工暴動，共黨及左派份子亦乘機煽動羣衆實施反政府的革命運動。礦工在共黨武器支援下，與政府軍戰鬥，曾演變成內戰。巴潤托就任總統後，即壓制工會組織轉入地下，禁止共黨及左派政黨活動，並與古巴斷絕外交關係，驅逐所有共黨國家人員離境。

巴潤托逝世以後，國內政治開始混亂，具有傳統鬥爭的勞工運動，又乘機再起。奧阮杜執政開始，爲與勞工妥協，恢復已中斷七年的勞工談判。奧阮杜採取開放政策，准許工會活動，並釋放一些已被監禁的左傾勞工份子。另一方面，奧阮杜表示容納左派力量，首先就在政府重要職位上，任命一些左派人士入閣。諸如前左派天主教日報社長貝萊 (Alberto Bailey) 出任新聞部長，曾被巴潤托下獄的左派份子聖達庫茲 (Ouroga Santa Cruz) 出掌石油及礦業部長。所以在此期間，國際間曾意味着玻國政治將有重大改變。

玻國工會活動獲得開放，勞工領袖雷欽即返國領導工人運動，加緊迫使奧阮杜政府繼續向左。至一九七〇年四月，玻國勞工聯合會在首都拉巴斯召開第二十屆大會，這是工會活動被禁多年以來第一次集會。來自於全國各地的工會聯合會代表，在會中一致擁護雷欽繼續做他們的領袖，並一致通過促使奧阮杜政府建立「社會主義」政權，排除政府中所有保守派份子。所以在這次勞

工大會以後，玻國情勢更有不正常的發展；勞工及左派勢力的壓力，又迫使奧阮杜必須接受他們的請求，改組政府。所以在同年五月，在其包括九個文人和六個軍人的內閣中，奧阮杜撤換了外交部長維拉德 (Cesar Ruiz Velarde)，由更爲偏左的卡馬紹 (Edgar Camacho) 接替，勞工部長阿納約 (Mario Rolon Anaya) 因被勞工份子攻擊最烈，而改由曾被巴潤托撤職的左派官員哥拉多 (Samuel Gallardo) 上校出任，石油及礦業部長聖達庫茲因是政府中重要左派份子，所以出任新的石油部長，並兼任總理。

奧阮杜政府的三軍統帥都萊斯 (Juan José Torres)，在一九六九年九月軍事政變中，亦曾担任重要角色。他與石油及礦業部長聖達庫茲都是石油國有化的執行人，所以三軍都認爲他們在保衛國家主權方面是「革命」的鐵臂。事實上都萊斯原不屬於極右或極左派，他只是受到拉丁美洲民族主義風潮的影響，然而顯然的，他鼓動軍中民族主義革命，不但在軍中發生了不良影響，並且亦被共黨所利用。在這種情勢之下，軍人已不固守他們的營地，尤其那些曾圍剿山區共黨游擊隊的軍人，亦爲了要達成極受共黨歡迎的「社會主義」目標，支持勞工的活動。一九七〇年五月一日那天，在拉巴斯有幾千個勞工舉着「革命」的牌子，通過首都的街道，在勞工示威行列中，赫然的有很多穿着軍人制服的軍官，走在勞工隊伍的前面。

由於工人運動的影響，左派與極左派所操縱的學生運動，自一九六九年九月在拉巴斯示威以來，已逐漸在全國各地蔓延，演變成工人一樣的「革命」運動，好像玻國的政治，又面臨一次風暴的前夕。

伍 共黨武裝叛亂再起與左、右兩派的鬥爭

誠然，玻國此種紛歧的政治暗流，特別是奧阮杜企圖與工會妥協的措施上，就使經常受共黨及左派政黨影響的工會，對國家政治產生更大的影響。在起初工會的要求，只是希望奧阮杜政府能保衛民主程序，避免使用殘暴手段的巴潤托時期再次到來，當時奧阮杜答應尊重勞工的要求，就如尊重每一個國民的理想一樣。但是後來當工會又要求奧阮杜政府走向「社會主義」時，奧阮杜就感到難以應付。雖然奧阮杜改組了政府，但政府中一些保守派官員仍在，諸如陸軍司令米朗達 (Rogelio Miranda)、內政部長奧哥羅 (

Juan Ogoroa)、商業部長瓦藍撒(Edmundo Valencia)等，仍具有相當的實力。因此，工人運動並未因奧阮杜的妥協而緩和下來，相反的，由於共黨的推波助瀾、雷欽與左派政黨結合，而使得工人運動的情勢更為緊張了。

玻國共黨以工會為掩護，乘機大展鴻圖，這是共黨的一項陰謀。因此在工會要求奧阮杜解除對共黨的禁令未果以後，共黨及左派政黨已不相信奧阮杜政府會變成一個新的「社會主義」政權。所以一些激進的共黨份子就在拉巴斯的北部，一個熱帶森林地區——屋比尼(Haut Beni)重建了他們武裝鬥爭的基地。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三日，在柯恰奔巴(Cochabamba)有極左派學生科艾爾(Jenny Koeller)被警察槍殺，而引起全國性的學生騷亂。亦由於這次事件，而招致武裝叛亂共黨的報復。七月十九日，就有三十個共黨武裝叛亂份子攻擊拉巴斯以北二百公里的戴彭特(Teoponte)小鎮。他們佔領達數小時之久，焚燒美國人的商店，並綁架了名叫斯柴候塞(Eugen Schläusser)和利爾契(Günther Lerch)的兩名西德工程師。奧阮杜面對着整個拉丁美洲如巴西、阿根廷、瓜地馬拉等綁架風潮所造成的悲劇，乃基於人道主義而立刻答應了綁匪的條件，以十二名政治犯，交換二名西德工程師的生命安全，但是這却招致了保守派的不滿。陸軍司令米朗達下令包圍拉巴斯大學，拘捕左傾學生，內政部却拘捕共黨及工會的重要份子，如親匪的共黨頭目貢撒萊斯(Raul Gonzales)、工人革命黨頭目瑪利亞(José María)及勞工領袖雷欽等均告被捕。並且陸軍司令米朗達與內政部長奧哥羅都表露着要排除奧阮杜政府中所有左派勢力的意圖。

陸軍司令與內政部長聯合壓制左派，對奧阮杜要與左派妥協而言，無疑是一大打擊。雖終於奧阮杜在保守派壓力下，解除新聞部長貝萊及石油部長聖達庫茲的職務，但馬上就恢復了為緩和軍中民族主義情緒，曾被去職的三軍統帥都萊斯的職務，以防止保守派軍人領導政變的陰謀。

在巴潤托總統時期，因蓋瓦拉死亡所引起的爭執，已使軍中領導階層有了裂痕，只是經過了三年，至奧阮杜執政以後才爆發出來。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間，奧阮杜在一項義大利電視公司訪問中曾指出，一九六七年十月八日晚，巴潤托總統召集四位政府高級首長舉行一項決定蓋瓦拉命運的會議，當時他曾反對殺害蓋瓦拉。另一位亦參加此項會議的都萊斯將軍，亦對義大利

記者表示曾對殺害蓋瓦拉作過強烈的反對，並且他說，在蓋瓦拉死亡以後，已經知道「寡頭的獨裁」政府已扮演國家災難的角色。然後新聞部長貝萊就對左派要求釋放已被判重刑的法國教授戴伯瑞事件發表聲明，他表示其被判重刑，主要亦是受到陸軍司令米朗達、內政部長奧哥羅的壓力，並暗示蓋瓦拉之被殺害就是這兩人堅持下執行的。

陸 結 論

一九六七年玻國共黨的武裝顛覆，曾是拉丁美洲共黨動亂以來，情勢最嚴重的一次。雖然在美國及鄰國援助下解除危機，但玻國共黨勢力並未完全消失，只是玻國共黨武裝鬥爭經過嚴重的挫敗，內部更加分裂，大部份共黨份子均轉入到國民黨黨旗幟之下。國民黨革命黨於一九四〇年創立，一九四三年開始執政，一九五二年巴斯領導該黨左傾而更增強了它的勢力。巴潤托總統時期，由於國家革命黨經常鼓動礦工暴亂，而成爲國家災難的根源。至奧阮杜政府成立，爲求政局鞏固，解除左派政黨的威脅，即容納國民黨，以便與工會妥協，因而就給共黨造成可乘之機。另一方面，奧阮杜領導政變，尚非受到整個軍方之支持，尤其巴潤托時期的保守派軍人，使其更感顧忌。因此，他要容納左派，但又不能接受左派要求，排除保守派於政府之外。以致使其自執政十個月來，經常陷入在左、右兩派的鬥爭洪流之中。奧阮杜爲避免左、右兩派的暗礁，必須要左、右逢源，始能對左、右兩派的壓力長期抵抗下去。就如玻國共黨及左派團體，因不滿軍方謀殺蓋瓦拉，從來都沒有隱藏對奧阮杜政府的不滿。雖然他們對奧阮杜政府發動已在拉丁美洲國家引起共鳴的國有化運動表示歡迎，但他們要使玻國出現一個共產主義政權的陰謀，從來都沒有改變。所以可以想像到，共黨再發動武裝叛亂，綁架二名德國工程師，就是他們已不再對奧阮杜政府有任何希望。在保守派方面，他們對奧阮杜接受左派的壓力，使其政府逐漸左傾，已感焦慮。至奧阮杜答應綁匪條件，釋放十二名政治犯，更使保守派不能忍耐，而就表現出要推翻奧阮杜政府的意圖。所以自保守派軍方拘捕共黨及左派重要份子，佔領拉巴斯大學及迫使奧阮杜解除新聞及礦業部長的職務，已顯示保守派的勢力又告恢復。

近年拉丁美洲國家與美國在經濟利益方面之衝突，不但招致拉丁美洲民

業生產，並且在大寨制度之後，企圖恢復舊有制度，正如同廣東省逃出的難民們所講述的，一直到現在為止，農民基本變化是農民的主動性和集體工作的情緒低落。

大寨發展其新工分的評價制度是從一九六〇年開始的，雖已推行了很多方式，到最近才見到排斥的現象，因為他們不願意見到那種結果。多年來，毛共經常從事其理論性的工作，鼓勵社員們接受這種新的制度，最近，却把大寨的制度為全大陸農村工作的標兵，具有威脅性，鼓勵社員們從事是項制度。就如同早期的「人民公社」，在農村所進行改革具有一樣的情況。大寨的經驗，被介紹為所謂全面顧到的制度，既沒有經過長時期的試驗過程，也沒有適當的準備來做深入的教導，同時，大寨制度推行到任何地方，都沒有經過一項嚴密的計劃。我曾說過，生產隊，是以當地的條件來鼓勵進行此一新制的試驗，但仍保留其當地的原有精神。雖然試驗進行是自由的，但和舊制相比較，仍有背道而馳之感，至少，農村人口在接受試驗制度之時，是被分割了的，是勉強性的。

我

個人分析，共匪在大陸農村進行工分評價制度的問題，是一項我們值得研究的問題。我所訪問自大陸逃出的難民，他們只是散居在廣東一省的農民，其中大部份在逃出來的時候，大寨制度試行不過一年的時間。大多數被訪問的人，他們當時都是在大寨制度下，身受其苦的農民，有一項事實，使得他們不愉快的，就是說，他們把這項新制度，抱着一種完全反對的態度。研究大寨工分制未來的評價，必須要有關於這方面更可靠的資料做參考，特別是關乎到這項新制度，影響到勞力的動能和農業生產的情況。我們想像得到的問題，在其他地區應用大寨制度所能發生的作用如何，和如何能及時克服的問題。也可能在此新制進行的初期，我的被訪問者，只看到了新制的正面效果，諸如改進勞工之質量問題，擴大政治的活動力等。有些精力旺盛的代表勞工，但他們的工作能力和技術太差，而是否可把新制適用於政治活力強而工作熱力消沉農民的身上？所有被訪問者認為，共匪過份着重政治標準，因而失去了勞動力的成果，或者可能政治標準經過長時間以後而成為正式之項目。這一說法，似乎假定了此一趨勢是很難打破的。

大寨制度是和「工分掛帥」背道而馳的情形，在「文革」以前就很普遍，這和早期共匪實行「人民公社」的自由供給新津制有很大的差別。有些地區

共匪在大陸農村推展「大寨」式之「工分制」

，在進行新制時，保留了公社的基本口糧，醫藥和教育，這些比例，是在「文革」以前，按照工分分配總數來分配的。不管怎麼說，這些分配的数字，比公社早期的試驗時要合適些，在很多的事例中，有50%——60%之純所得，是自由供給方式的，農民全部所得，雖然生產隊所得的差別已經減少，但還是按照工分所得的來分配，大寨之新制試行比之於人民公社初期的分配制度，還是一個比較謹慎的改革，因為在這裏面，對很多農民尚保留了些物質刺激。大寨試驗，也着重社員相互的管理和批評工作，同時防止在公社試驗期間所發生遊手好閒現象的發生，是否這些經過修改而能保持大陸農民的工作情緒，而避免在公社早期，所發生農業生產的低落，這些都是有待解決和要了解的問題。

刊物名：Current Scene

原名：The Tachai Brigade and Incentive For The Peasant.

作者：Martin King Whyte

期卷：August 15, 1969, Vol. VII, No. 16

——上接第57頁——

族主義情緒高漲，且引起各國政府反抗美國的控制，脫離美國之意向，玻國外資充斥，難免不受到影響。但奧阮杜徘徊於國有化路途上，因本身資金缺乏，又不敢冒著與美國斷絕外交關係及停止所有援助的危險。在此種情勢下，奧阮杜雖尚未依循任何真正的改革程序進行，但在其各項政策上，尤其是外交政策就開始左傾而聲言與包括古巴在內的共黨國家建立關係。蘇俄企圖改變以美國為領導中心的美洲國家關係現勢，就如對其他南美洲國家一樣，乘機以經濟貿易為餌，派遣經濟及技術代表團訪問玻國，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日，兩國即建立了外交及商業關係。從今年一月展開的貿易及技術合作談判，蘇俄同意購買玻國的礦產，並以技術援助開發玻國的礦藏。在今年八月十五日雙方簽字以後，玻國駐蘇俄大使埃龍(Julio Ganett Allion)即聲明玻、蘇之友好合作，主要是解除美國資本壟斷的威脅。因而奧阮杜政府以蘇俄的援助繼續排除美國在礦產開發方面資本的意圖，仍是很明顯的。所以玻國當前左、右兩派的鬥爭，奧阮杜面對保守派的壓力暫時後退，但尚不能證明他已放棄企圖利用左派力量，以達成建立「納塞主義」的目標。

註一、諸如古巴共黨中央委員維達斯(Juan Vitalio Acuna Nunez)、桑契斯(Antonio Sanchez Diaz)、歐維斯(Eliseo Reyes Rodriguez)、瑪西恩(Ricardo Machin Hoed)及曾任古巴邊區司令的藩都哈(Orlando Pantoja)等，他們都先後以巴拿馬或烏拉圭護照，以化名潛入玻利維亞。

註二、一九六八年，玻利維亞年產石油二百二十萬噸，但海灣石油公司，佔總生產量的五分之四，一百六十二萬噸。同時天然氣之生產，在全部產量六千七百二十萬立方公尺中，該公司亦佔四分之三。